

浙江省教育规划重点研究课题

秘书 职业化

当代秘书与职业准入机制研究

杨群欢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浙江省教育规划重点课题

秘书职业化

——当代秘书与职业准入机制研究

杨群欢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秘书职业化：当代秘书与职业准入机制研究/杨群欢
著。—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6

ISBN 978-7-5601-3626-4

I. 秘… II. 杨… III. 秘书学—研究 IV. C93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84729号

秘书职业化——当代秘书与职业准入机制研究

作 者：杨群欢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刘子贵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16 字 数：232千字

ISBN 978-7-5601-3626-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 址：长春市明德路421号 邮 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8499826

网 址：<http://www.jlu.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浙江天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2007年6月 第一版

2007年6月 第一次印刷

定价：25.80元

前 言

秘书工作的职业化，是指在组织上制度上建立秘书的分级分类体系，明确各类秘书的职责范围。通过专业教育手段培养秘书从业人员，以规范的考核评定秘书的就业资格和工作水平，实现秘书工作的专业化管理。1997年底，我国秘书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正式启动。这项工作的开展，适应了秘书工作社会化发展的需要，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秘书职业技能要求的变化，将推动秘书专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标志着我国秘书职业的专业化、规范化管理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近年来，为加快秘书职业制度建立的进程，各界人士出谋划策，进步不小。然而，秘书职业资格考试与秘书职业制度是两回事。虽然国家秘书职业资格考试也已经开展多年，但我国至今尚未真正走上秘书职业化轨道。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来看，建立和完善秘书职业资格制度，已成大势所趋。

1997年8月劳动部颁发的《秘书职业技能》以及《国家职业教育技能鉴定规范(秘书)》等行政法规。但这些规定并没有对秘书工作性质、任职资

格等做出具体的规定,使得秘书的任职资格和工作性质还不明确。同时,社会对秘书专业性认识不足,也导致了秘书的选拔不规范。对秘书职业缺乏严格的专业学历要求,是导致秘书工作质量总体水平偏低,阻碍秘书的职业化进程的症结之一。

虽然目前在国际上针对秘书职业化已经有实施性研究,然而我国秘书职业化进程的研究还刚刚进入实质性阶段,缺乏整体性研究。本著作通过对我国秘书、秘书职业和职业化进程进行调查研究,为我国秘书的职业化的全面推行提供一定程度上的依据。

秘书职业化的核心是素质和能力的专业化,专业化是职业化的基础。职业的准入,最重要的是看专业水平是否符合秘书职业的要求,是否具有必要的职业技能。同时,职业化必须研究当代国际国内秘书职业发展的基本特点。

当然,加快秘书职业资格制度的建立,不仅需要秘书界本身的努力和各级领导的重视,还需要社会各行各业的支持和配合,形成一个成熟的社会大环境。但由于社会各界对秘书职业化和社会化认识的局限性,有关部门对出台配套措施不积极,社会用人机制的不完善,秘书教育体制和选拔机制的相对滞后等等,都会成为阻碍秘书职业资格制度建立的因素。

本著作主要以秘书职业和秘书职场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为主线,从秘书的职业内涵、新时期秘书职业的机遇和挑战、秘书职业素养的时代要求、秘书职业能力的多维分析、秘书职业的美学与文化视角、秘书教育的中外比较和对策、秘书职业生涯设计以及秘书职业化进程与准入机制等方面,全面比较分析研究。著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注重结合新时期秘书职业的特点,提出了秘书人才、教育机制和选拔机制的对策。

大力加强秘书的职业化建设,提高职业素质,强化高等秘书教育,严格职业准入,树立职业形象,完善职业监督等,都迫切需要外在体制来保障,通过秘书职业制度化来实现。这也是本著作研究的核心内容。

目 录

第一章 秘书与秘书职场的发展比较	1
第一节 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的发展体系	1
第二节 西方发达国家秘书工作的发展比较	14
第二章 新时期秘书职业的时代特点	33
第一节 我国新时期秘书工作的特点分析	34
第二节 新时期秘书人才的调研分析	41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秘书工作的影响与应对	48
第三章 职业伦理——秘书道德的本体思考	62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与新时期秘书的职业道德	63
第二节 国家公务秘书职业伦理的理性思考	72
第三节 秘书权力腐败及其应对策略	85
第四章 职业能力——秘书人才的核心课题	100
第一节 发达国家秘书职业能力要求的比较分析	100

第二节	WTO与当代秘书职业能力发展的新趋势·····	108
第三节	学会沟通——秘书职场的金钥匙·····	115
第五章	职业精神——秘书职场的文化视角·····	124
第一节	职业秘书的文化精神·····	124
第二节	当代秘书的美学修养·····	134
第六章	职业规划——秘书职业生涯的发展策略·····	145
第一节	秘书职业生涯设计的时代价值·····	145
第二节	竞聘职场——秘书人生发展论·····	155
第三节	形象塑造——秘书工作方法论·····	163
第七章	职业教育——秘书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177
第一节	中外秘书教育特点的比较分析·····	177
第二节	能力为本位的高职秘书教育创新机制·····	190
第三节	职业化背景下的高职秘书课程特色——以《秘书理论与实 务》为例·····	202
第八章	秘书职业化——秘书准入机制的发展研究·····	214
第一节	中国古代人才选拔与秘书考核制度的启示·····	215
第二节	西方文官制度与中西方选用秘书人员特点比较·····	232
第三节	职业准入——当代秘书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240
参考书目	·····	250

第一章 秘书与秘书职场的发展比较

“秘书”无论作为一个工种还是一种职业，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都已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也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内涵，这已经为世人所共识。尽管中外秘书史并不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但将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的发展和西方发达国家秘书工作的发展（中外秘书职业的发展体系）作为本课题研究的引子，既是出于对秘书职业化研究的逻辑性、整体性的考虑，同时也是对秘书职业内涵和文化价值的挖掘，建立当代秘书职业准入机制，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的发展比较

一、中国古代秘书与秘书职业

“秘书”一词在我国出现较早，大约在汉代之前就已经出现。当时的

秘书主要是指神秘之书或秘藏之书。《说文》：“秘书曰：日月为易。”段玉裁^①注“秘书，谓纬书。”即占验术数，预卜未来的谶纬图录之书。

《汉书·刘向传》：“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就是指秘藏之书。汉代以后，秘书逐步成为一种官职名称。东汉桓帝始设“秘书监”，管理秘藏之书，官职大约相当于今之图书馆的馆长或档案馆的馆长。三国时曹操始设“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掌管机要之职，具有了当今秘书工作的一些职能。

《后汉书·郑玄传》记，郑玄给儿子的信中说他青年时代“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秘书”一词有时还指国家机构。

《汉书·叙传》记载：“游博学有俊材……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游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这里“秘书之副”中的“秘书”即指机构。

到了公元2世纪，东汉桓帝时，“秘书”一词才开始用来作为官员职务的名称。《文献通考》^②：“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这里的秘书并非官名，要在秘书下缀上“令、监、丞、郎”等才是完整的官名。尽管这时“秘书”一词的涵义有了变化，由原先指物变为指人，但所指的人（即被冠以“秘书”称谓的官员“秘书监”），掌管的仅仅是朝廷的图书典籍而已，并未从事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秘书工作。东汉末年，曹操为魏王，设秘书令以“典尚书奏事，并掌图书秘记之事”。曹操不设尚书而设秘书令，

^①段玉裁（1735—1815），中国清代经学家、文字音韵训诂学家。字若膺，号茂堂，晚年又号砚北居士，长塘湖居士，侨吴老人。江苏金坛市人。生于雍正十三年，卒于嘉庆二十年。所著有《六书音均表》、《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汲古阁说文订》、《说文解字注》及《经韵楼集》等书。《说文解字注》积30余年的功力写成，体大思精，为前所未有的。

^②《文献通考》，宋代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全书分为24门，348卷。自《经籍》至《物异》等5门为《通典》所未有者，此外19门均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

目的是为了使他中枢秘书机构的主管人员，在名称方面有别于东汉宫廷秘书机构主管人员，以避“篡位”之嫌。但他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由秘书令取代了尚书的职权，使秘书令不但掌管了“图书秘记之事”，还掌管了草拟奏章、发布政令之事。秘书令所掌管的这后一种职权，是以往任何一位曾被冠以“秘书”称谓的官员所没有的。因而可以说，曹操所设的秘书令，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与现代“秘书”一词涵义基本相同的古代秘书官职。不久，魏文帝曹丕即位，“置中书令，典尚书奏事；而秘书改令为监”（《晋书·百官志》），即将朝廷秘书机构的纳奏、出令之事，改由中书令掌管；秘书令改名为秘书监，并恢复桓帝时秘书监只掌管图书典籍的职能。此后，历代封建王朝虽然大都设有名为“秘书”的官职（如“秘书监”、“秘书郎”、“秘书丞”等），但其职能主要是掌管图书典籍，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秘书。而那些替封建王朝真正从事秘书工作的官员，却不冠以“秘书”的称谓，而分别冠以“中书令”、“中书舍人”、“记室史”、“掌书记”、“主簿”等称谓。

二、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制度溯源^①

我国古代秘书工作起源甚早。《世本》载：“黄帝之世，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最早的秘书人员称为“史”。而黄帝的这些专职秘书人员已有明确分工，显然在黄帝之前已存在秘书和秘书工作。

而最早出现的秘书机构，当为商周的太史寮^②。周代时趋于完备，“五史”分工，各司其职。初创了一些秘书工作制度，主要有公文制作制度（如《论语·宪问》记郑国文书制作就经由草创、讨论、修饰和润色等环节）、文书签名及正副本制度、官文书归档贮存制度、“泥封”加印等保密制度、“采风”观政和调查的制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秘书工作制度日益完备，设丞相府、太尉府和御史大夫寺。御史大夫“受公卿奏章，掌天下文书”。汉承秦制。谭嗣同

^①王毓琨、杨群欢主编：《秘书理论与实务》，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②官署名。商末年始置，西周相沿。其长官称太史，见于甲骨文和金文。掌国王的册命及祭典等事。

《仁学》：“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秦汉建立了秘书官员分工责任制度、文书工作制度、参谋谏言制度、文档图书管理制度等，尤以文书工作制度为突出。如规定了策书、制书、诏书和戒谏为御用文书（下行文），章、表、奏和驳议为官僚奏疏（上行文）。确立公文运行传递制度，如逐级行文、邮传和行书记录与回文制度（记录公文传送行程、时间及收发文登记）等。

魏晋南北朝承秦汉之制而有新的发展。有专事皇帝起居注的秘书官员，所记堪为后代“大事记”和“会议记录”之源头。确立文书签押与官印移交制度，并将泥封加印法改为在公文末页盖“朱色水印”。此外还规定，公文用纸“入潢”（重要公文用黄檗汁浸染防蛀），判事批文“朱出墨入”（判刑用墨笔，已刑用朱笔）。

隋唐五代公文拟写普遍采用“一文一事”制，并建立公文移交制度，“引黄贴黄”制度（“贴黄”，在公文有误之处贴黄纸予以改写；“引黄”，把来文摘要写在黄纸上贴于来文之前）。《唐律疏议》有近三十条关于文书制度的条款。信访工作由检察御史专管。秘书选拔主要通过科举考试，产生学士型秘书。建立秘书工作责任制度，唐有“四禁”：“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违失，四曰忘误。”（《旧唐书·职官志》）

宋代“一文一事”的行文规则已制度化。《庆元条法事类》卷十六有：“奏陈公事，皆直述事状，若名件不同，应分送所属，而非一宗者，不得同为一状”。文书的收发、登记、送阅和催办已环环相扣，程序分明。从中央到地方官府普遍设立档案库（架阁库），档案管理已形成制度。设有登闻鼓院^①，上访者如觉鼓院处理不当，可向检院^②继续申诉。

元代文书档案已采用“一案一卷制”。立卷与归档已注意新案和旧案

①简称鼓院，是宋初管理登闻鼓的机关，是受理向朝廷直诉案件的三个法定机关之一，专门受理诣阙投诉者的上诉状。凡欲向皇帝报告公私利害、朝政缺失、理雪冤案等事，都可经登闻鼓院进状上闻，登闻鼓院不接收的，再向登闻检院进状。

②简称检院，是受理向朝廷直诉案件的三个法定机关之一，专门受理诣阙投诉者的上诉状。“检”指密封书状。检院处理鼓院不予受理的书状。未经鼓院者，检院不得接受。

之分别，注重案卷的“问题特征”。以“急传铺”传递紧急公文。公文撰写以白话入文。建立公文照刷、磨勘制度，检查公文有无稽迟、违误、遗漏以及检查照刷发现的错误是否得到纠正。

明代建立了票拟（条旨）制度，即阁臣在收阅奏章后，用小票（纸条）拟出处理意见，附呈给皇帝审查定夺，类似现代公文处理的“拟办”。明中期以后，批答奏章的权力落入司礼监手中。明太祖置“通政使司”，以加强信访力度。

清代雍正王朝设军机处，皇帝谕旨由军机大臣草拟，呈皇帝阅定后发谕旨交内阁颁发，机密谕旨由军机大臣封寄。创立了密奏制度。清代中央一级档案馆资料保存较好，有内阁的题本（官员向皇帝呈报政务的公文）、军机处的朱批奏折和寻副奏折等。地方档案和私家档案（如曲阜孔府档案）也甚为丰富。晚清政府还制定了《惩治漏泄军事机密章程》。

明清增加急密文书（如明之“题本”、“揭帖”，清之“奏折”），健全从京师到各地方的驿传系统，设“捷报处”负责速呈奏折及交发谕旨与折批等。

三、我国古代的机关秘书

中国从东汉起便有秘书省、秘书寺等官署，及秘书监、秘书令等职务，一直沿袭到金元。但是，除了三国魏时的秘书监是个例外，其余的机关性质与职掌，大抵都在国家档案馆、图书馆、文史馆及出版署范围。至于现代秘书的基本工作，诸如协助首长办理文书、汇总情况、交办事项，乃至与闻机要等，向来另有专职，而且在历史实践中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反复。

从秦汉时期的官府组织看，现代人所理解的首长秘书专业，还没有从一般的文牍事务分离出来。可以说，凡在各级政府机关供职的令史，即后来统称为文吏或书吏的一般办事员，都有执行秘书业务的可能。《梁书》卷三七说，魏晋崇尚玄虚，当官的多以放诞为时髦，“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其实这也是秦汉时的普遍景象，不过那时行政作业之所以“皆成于令史”，并非各级执政者贵为放诞，而是军功和勋贵出身者大多略输文采吧。后人点评秦汉政治，多谓其实是“文法吏”在各级机关

当家，正可借这个视角观察。西汉起，开始通过孝廉试经、明经射策、诏令特任等方式，吸收一批来自民间的知识分子当台郎，其中不少人也靠执行秘书业务起家，故《南史》卷十八称，汉时“郎官位卑，亲主文案，与令史不异”。要之，令史是吏职，台郎身份虽然略高于令史，也只是入仕的一个台阶。所以笔者认为，秦至东汉前期的秘书不仅没有形成专职，而且地位普遍不高，甚至笼统地称为“椽史”也是可以的。

迄东汉三国，开始发生变化。先是太傅、太尉等中央高级部门内，大都设置了专司文案秘书职能的“记室”，并以“记室令史”为专门职称，其工作性质就是“掌上章奏报”（《通典》卷二十）。《后汉书》卷八十记，汉和帝初年，车骑将军窦宪仰慕傅毅的文才，聘请他任“主记室”，从此“〔窦〕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这个“主记室”，大概可以解读为首席秘书或秘书室主任。又《三国志》称，曹操任司空，以陈琳、阮管记室，军国书檄大多出自这两个人的手笔。往后，整个两晋南北朝时代，上起诸王三公，下逮州郡守尉，以及一切有权开府的军区司令或军分区司令，均置记室。其职称区别，大抵是行政机关称记室、记室令史、主书令史、书令史等，约见首席、主任与一般人员的差别；如果是军事单位，则称记室督、记室参军。督为军官之名，参军即参谋军务的简称。用现代话讲，这些秘书就是部队里穿军装的文职人员。此外，在县一级的基层政府中，也有记室设置，这个县政府秘书科里的成员，有主记室史、主记椽、主记、主记书佐、记室书佐等多种称谓。

到汉末三国，从中央到基层，公府军政各级机关，秘书职能已经从一般的文书业务中独立出来，而且形成了编制和职称制度。凡首席秘书的官秩都随首长的级别浮动，如三国魏的三公为一品官，像陈琳这种司空府记室就是七品，相当二等县的县令。再以南朝陈的官品为例，记室和记室参军的品阶，因首长的级别等差，可以分为第六至第九品共四个级别。古代的九品官制，通常以五品为高级官员的门槛，只要能当上五品首长的首席秘书，好歹就能挤进九品即“官”的末秩，否则就只能在“吏”的编制内

排座次。但是和过去相比，相当一部分高级衙门的首席秘书有了官品，所有机关的秘书岗位都有了编制和独立的职称，说明专职秘书群体的地位普遍提高。《后汉书·舆服志》载“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出行仪仗，前有“门下五吏、贼曹、督盗贼功曹，皆带剑，三车导”，即警卫队长、公安局长等三人武装开道，然后一概是“主簿、主记，两车为从”，就是办公室主任和首席或主任秘书各乘一车相随。当时的官车，除驾驶员外，只能立乘一人，假使换成现代的四座轿车，这位秘书（主记椽）自然是紧随首长一起坐在同一部轿车里吧。

秘书官职虽低而身价颇高，首当其冲的原因是这类职事必须会写一手漂亮的文章。陈琳为曹操“作诸书及檄”，将草稿送领导审阅。彼时曹操头风宿疾发作，卧读陈琳文稿后，翕然而起道：“此愈我病”（《三国志》卷二一）。陈琳后来和一起掌管记室的阮禹并列“建安七子”。梁朝文学家江革任雍州刺史麾下记室参军，与他齐名的兄弟江观也被聘为参军兼记室，任昉本人也是名列“竟陵八友”的著名文学家，曾为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的记室，其后又与也是八友之一的沈约一起担任雍州刺史萧衍的记室。萧衍即后来的梁武帝，最初也是“竟陵八友”。八友中的另外几位如范云、萧琛等，也都当过记室参军。魏晋南北朝的不少知名文学家，都有此类履历，如左思曾任西晋齐王记室督，郭璞曾任东晋权臣王敦的记室参军，南朝齐江淹曾以参军身份为萧道成掌记室，南朝梁何逊曾任庐陵王记室，等等。所以杜佑说记室之职，“历代皆为文士之华选”（《通典》卷二十）。

秘书写文章有不费斟酌、下笔敏捷的要求。《三国典略》说，阮禹随曹操出行，骑在马上为领导撰写致韩遂的信，“书成呈之”，曹操拿一支笔欲有所修改，“而竟不能增损”。西晋时孙惠任司马越的记室，“每造书檄，〔司马〕越或驿马催之，应命立成”。孔寅任安东将军司马睿参军专掌记室时，“书命盈积”，就是有待处理的文书堆满了办公桌。孔寅出手飞快，领导赞其“称职”。《晋书》卷九二述袁宏“文章绝美”，为

“一时文宗”。其任大司马桓温记室时，写过一篇《东征赋》，追述诸多东晋开国名臣追随晋元帝渡江中兴的功业事迹。但同事们传看草稿后，发现文章里没有提及桓温的父亲桓彝，不免背后议论。桓温“知之甚忿”，找一个机会责问他：“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袁宏忙说写进去啦，因为还未定稿，所以不敢拿出来请您看。桓温怀疑他说谎，逼问“君欲为何辞”？袁宏当即朗朗答云：“风鉴散朗，或攫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宣城之节（桓彝在宣城内史任上抗拒叛军牺牲），信义为允。”听得桓温直掉眼泪。传出来的草稿里，也没提到另一位中兴名臣陶侃。陶侃的儿子胡奴得知后，把他骗到密室里，拔出快刀责问：“家君勋迹如此，君赋为何遗漏？”吓得袁宏忙说：“我已盛述尊公，谁说遗漏了？”胡奴逼问你是怎么写的？袁宏口诵道：“精金百汰，在割能断，功以济时，职思静乱。长沙（陶侃封长沙郡公）之勋，为史所赞。”胡奴很满意，便把刀收了起来。

南朝梁时，颜晃以“有词采”，受聘于邵陵王府，兼记室参军。当世著名文学家庾信为东宫学士，因为能写会说，常奉命出使诸藩。邵陵王唯恐被他看轻自己的班底里没人，点名让颜晃“接对”。双方话锋相交，神气活现的庾信马上吃瘪，这位颜记室从此便被人刮目相看了。其后梁元帝派亲信杜龛出任吴兴太守，因为知道杜“专好勇力”，特意调选颜晃去做他的主任秘书，并关照杜“造次之间，必宜谕禀”（《御览》卷二四九）。《渊鉴类函》介绍古史上记室参军的事迹，专设“斥巧言、对行优”的名目，所述皆为秘书能说会道、替首长挣面子的故事，文繁不录。

词采华美、才思迅捷之外，与闻机要的高级秘书尚有一条不可或缺的禀赋，那就是机警慎密：要你卖弄时，自当为主逞才；要你保密时，务必金人缄口，甚至还得有一点甘当幕后英雄的美德。《三国志》说钟会以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为心腹之任，时人谓之“子房”；《晋书》说郗超在大司马府任记室，躲在帘帐后记录首长和人交谈，谢安称其为“入幕

之宾”。这两个有名的典故，生动地点明了魏晋时期高级秘书与所事长官间非同一般领导和下属的关系。《宋书》卷八四载，南朝宋衡阳王刘义秀选调秀才出身的孔凯署理记室，孔凯固辞，道是“记室之局，实惟华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我这点资质“非所敢冒”；又曰“夫以记室之要，宜须通才敏思，加性情勤密者”，而我“学不综贯，性又疏惰，何以属知秘记”？这些议论，可以说是把做一个称职秘书的基本要求都讲全了。

魏晋南朝的机关秘书，虽然大都有定员定薪的统一编制，但一般多由领导自己聘用，然后往中央人事部门办理备案手续就行了。一个有文才有名声的人进入官场当秘书，起步是什么头衔，享受哪一级官品待遇，盖由受聘于哪一级机关所决定。

两晋南北朝政权主体构成的一般特征，是世家大族垄断大权，堵塞寒门进身之路。但是各种利益集团对记室、主簿、参军一类幕僚人才的大量需求，恰恰又给这些寒族士人开辟了一条由入幕参政的另类仕途。以秘书为例，仅从官制上看，品秩最高不过六品。但后来众多参预机要的秘书后来都有了“领某郡太守”、“迁散骑侍郎”、“补领军司马”、“赐爵某县侯”的较快的提升，惟其典掌书记的记室本职不变，用现代话表述，就是虽然工作岗位未变，但级别和待遇已经焕然一新，而且会随着首长地位的提升，继续水涨船高，甚至因参预废立大计或实现改朝换代，搭乘上驶向宫廷的直通车，最终成为“典掌诏命”的中枢重臣。稍知这一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正是这400年间，这种“入幕之宾”、“王佐之才”特别活跃。清人赵翼说南朝多有寒人掌机要，如果从秘书参政这个视角观察，应该说这种现象远从魏晋就已出现了。如曹操赏识提拔的刘放和孙资两人，都是毫无家族背景的漂零子弟，皆以“善为书檄”起家秘书，各自经过一段外放，再入帷幄干老行当，等曹丕称帝后，以参预禅代的“佐命”之功，一个当秘书监，一个当秘书令，各加给事中，用白话讲就是从丞相秘书做到魏王秘书，再变为皇帝的主任秘书，掌撰诏命，典作文书，总领机

要，发布政令，看似官品比他们翻一番的政府首脑们，不过受命而已。笔者读书印象，历史上以“秘书”为名的职官和官署称呼，得与今人对“秘书”涵义理解最接近的，就是曹魏这一段时间，不久便改称中书监和中书令。其后典掌诏命的皇帝的机要秘书机构，基本沿袭这个称谓，而秘书省、秘书监之类，则取典掌禁中秘记图书之义。像刘放、孙资这类由“秘书”进步为中书的事例极多。当然，这些人也不尽为寒门子弟。但总体上讲，他们都以激扬文字为指点江山的本钱，在改造魏晋贵族政治的过程中，又开启了唐宋文人政治的先河。

远从秦汉开始，上起三公诸府，下至王藩边郡，以及各将军府、刺史带将军开府（就是兼管军政的专区）等各级机关，都有“诸史之长，职无不监”的官员设置，通称“长史”，其职责相当于近现代高层机关的秘书长，辅佐首长综理事务并处理一部分重要政务。从任命方式、品秩待遇、实际作用等几个方面考察，秘书长和秘书有诸多区别，应该是另一个研究范畴了。

隋唐的机关秘书制度，在沿袭前代的历史惯性中开始变化。唐初诸藩在军事征服和相互倾轧的历史过程中，机要秘书之类仍旧是自行网罗的人才，只知长官不知朝廷。最典型的事例如李世民的秦王府十八学士，诸如房玄龄、杜如晦、薛收、虞世南这般人，虽然也有浑称府属的，实际上都是出典檄书露布、入参帷幄密谋的机要秘书。以房玄龄为例，早从李世民起兵反隋、徇地渭北起，就因温彦博的推荐成为他的记室参军，“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随着李渊父子集团的蛋糕越做越大，十余年间，他先后有过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加文学馆学士、封临淄侯等加官晋爵，但本职始终是“常典管记”的记室，“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贍，初无稿草”。李渊对他的评价是“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正因为有此洞察，所以在唐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表面化后，李渊点名要儿子将房玄龄、杜如晦两人炒鱿鱼，驱逐出府。不久，李世民蓄意发难，要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密召房、杜进府，并付佩